



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她·视·界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 理论与方法

Women's & G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ology



蔡一平 杜芳琴 主编

Eds. Cai Yiping & Du Fangqin

湖南大学出版社



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 理论与方法

Women's & G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ology



蔡一平 杜芳琴 主编

Eds. Cai Yiping & Du Fangqin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从“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史”，再到种族、族裔、阶级、年龄等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差异的历史”，这些命名的变化，深刻反映在理论概念分析范畴从“妇女”“父权制”到“社会性别”、差异、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转向，同时也反映在认识论、方法论对传统史学的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质疑，以及对“经验的证据”“经验的连续和断裂”“语言学转向”“科学历史学”进行重新审视、创新和批判。从对美国汉学家的代表作的书评和学术对话，可以看出以文献为主的古代史和以口述为主的现当代史妇女/性别史的研究走向。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历程、访谈进程、原则和材料整理，尤其是访谈者与叙述者的关系和意义解释，以及访谈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合作、信任和倾听，是理解口述真谛和材料意义的关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蔡一平,杜芳琴主编.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667-1049-9

I. ①妇… II. ①蔡… ②杜… III. ①妇女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5553号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FUNÜ YU SHEHUI XINGBIE SHI YANJIU DE LILUN YU FANGFA

主 编:蔡一平 杜芳琴

责任编辑:谌鹏飞 责任校对:全 健 责任印制:陈 燕

印 装: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6开 印张:21.5 字数:310千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1049-9/C·117

定 价:88.00元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691(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chenpf@163.com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译编者语（代序）



这本译文集从开始翻译到正式出版，经历了 25 个年头，其中有许多故事。可以说该译文集是跨时空、跨代际的国内外妇女史研究学者合作的成果和见证，也是中国本土妇女与性别史学艰难前行的一个记录。第一篇《妇女史的挑战》翻译始于 1989 年，是被誉为“妇女史‘教母’”的杰达·勒纳所著《一个多数群体发现她的过去》（*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书中的一章。译者是那时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蔡一平，毕业后她接着攻读该系妇女史研究生，在妇女史领域我们母女二人成了同行。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在中原、京津等地，妇女史研究形成了一个小气候，各种研讨会、讲习班、培训班频繁举办，我们都参与或筹办了 90 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举办的妇女史学术活动。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都有幸出席了在怀柔的 NGO 论坛，亲历了盛会的沐浴洗礼，之后坚定地走上了妇女和性别研究、教育和性别平等倡导活动之路，但妇女史研究一直是一种共同的“不了情”。

北京世妇会前后频繁的国际交流潮和国内妇女运动的需求，推动了妇女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妇女史学从研究到学科建设的集体活动转机是海内外中华妇女史学人的联手开始的，机缘是 1999 年 3 月在波士顿美国亚洲研究年会，期间几位有妇女史学背景的学者鲍晓兰、

王政、杜芳琴等开始面商，探讨暑期有无举办妇女史学科建设的读书研讨班的可能。恰天作之合，人成其事，经过几个月的不断协商联系，计划终于落实下来。但鲍、王、杜三人那时（7月份）都不在中国，于是蔡一平就被委托承担资料翻译和会务统筹工作，王政负责准备阅读资料和筹款，杜芳琴则负责联席会议参与者，以及导读者和主持人。很快，王政从美国给蔡一平寄来一大包资料，其中有斯坦福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法国史学家凯瑞·欧芬精心挑选、自费复印的西方妇女史发展历程和理论方法材料；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的鲍晓兰因工作不能前来参加，从美国寄来她的同事女性主义口述史创始人希尔娜·格拉克教授收集的妇女口述史研究资料。30篇文章要在一个月之内翻译并提前发给与会者，时间十分紧迫。那时英语专业翻译人才很少，蔡一平找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姐妹兄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研究生，还有天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老师，突击奋战，翻译了初稿；当时来不及审校，王政一到天津就放下行装开始了初校，以便利阅读。尽管这次翻译文稿选入本译文集的不足1/3，但其他篇章在多个妇女史活动的场合使用并收入读书研讨班专辑如《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引入社会性别：史学发展新趋势》（内部发行）等书中，为当时妇女史学科建设提供了奇缺难得的参考资料。

2000年初启动的由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将妇女史纳入其中，从这一年起至2006年，接连不断举办跨学科妇女学和妇女史学科研讨班、师资培训班，几乎每次都要补充翻译一些资料。资料的来源一直体现出跨国界的女性主义学者的友谊与合作，高彦颐、鲍晓兰、王政等海外华人学者和海外汉学家不断介绍国外最新妇女史研究成果，像《经验的证据》《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女权主义历史——对话语和经验的历史化》《中国特色的性别歧视论》和海外汉学界一批介绍妇女/性别史新成果的书评等篇章就是2000年举办妇女学的跨学科与多学科读书研讨班引进翻译的。至于《如何面对连续性：从西欧妇女经济地位谈起》《历史科学有性别吗？》的引入更是一系列的机缘——2001年，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

美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中国思想史”国际研讨会上，妇女性别史论坛召集人高彦颐将上述两文的作者著名欧洲史学者朱迪丝·贝纳特和史密斯·邦尼介绍给我们相识。其实我们两人与邦尼的相识是在2000年7月访问罗格斯大学，顺访邦尼的中心，那时她正在举办美国中学历史教师的妇女史培训班，蒙她惠赠大作《社会性别史：男人、女人与历史实践》，回国后，8月在天津妇女史读书研讨班蔡一平翻译并导读了邦尼书中的一章；在南京会上邦尼和贝纳特都慷慨惠赠大作并同意在中国翻译发表。2002年暑期，高彦颐来天津的妇女史研讨会讲学研讨，期间还对上述两篇翻译稿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审校。至于蜚声汉学界的苏珊·曼、高彦颐和贺萧，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相识且交往密切的朋友，她们深度地参与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除了讲学，还毫无代价地把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成果及时传递到中国，那篇2003年在密西根大学的讲演文稿《三人谈：书写中国妇女史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很快由王政组织翻译并在《社会性别》第三辑（天津，2007年）发表。

迟迟没能将精选的译文结集付梓，主要困难是缺乏专业和英语双美兼具的审校定稿者，到了课题将结束的2005年，承蒙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余宁平博士义担重任，审校了将近半数的文稿，增加了繁复的注解和参考文献。她与海内外其他参与翻译、审校和编辑者一样，基本上是义务和志愿性的，但遵守学术规范绝对是不打折扣的。

当回忆起女性主义史学界这一幕幕感人的真诚合作细节时，最值得缅怀纪念的是鲍晓兰博士，她自始至终热情支持并无私地为刚兴起的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添砖加瓦，除了回国讲学、参与妇女史各种研讨活动，对本译集的贡献同样感人肺腑：她不但提供了妇女口述史部分的全部英文稿，还于2003年3月校对了4篇中文译稿，用红笔细致地进行修改和增补，另附一信并寄给编译者详细说明修改增补的原因，但此后就失去了联系。直到三年后惊悉她离开我们的噩耗，才从她亲人那里知道：在病魔缠身生命最艰难的时刻，她不愿更多朋友牵挂，于是切断了电话，停止了回复电邮。本书将她的一篇亲历亲为感

悟于从事妇女口述史经验的文章《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和思考》收录书中，一方面是纪念感怀她的胸襟、心迹和治学精神，另一方面是分享她作为中外兼修的妇女史学者对女性主义口述史的理解、阐释和运用。所以说，这本译文集不仅是著作者、译校者、编辑者的贡献，更是海内外女性主义学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的见证和结晶。

二

下面简介该译文集的内容和意义。在选入译文集的16篇文章中，就内容来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理论、概念、方法论，二是中国研究，三是妇女口述史。

第一部分是关于妇女史的理论走向概括，以及基本的概念和方法论。这7篇还可以进行如下梳理：

其一，从概念命名、理论视角的变化中看国外（特别是美国）妇女史发展的历程（选篇以21世纪以前为主）。也可以说，从“称谓”看妇女史的理论走向、议题关注和方法论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杰达·勒纳的《妇女史的挑战》（1976年）就是以“妇女史”命名，将妇女史目标定位为“剥离出被传统史学掩蔽的部分”，以“重建女性历史的努力”。可见当时的妇女史重在发现妇女的历史，旨在填补妇女在历史上的缺失和贡献。该文对传统史的理论、议题、分期、史料、史学、范式和价值取向等7个方面进行挑战。十年后，斯科特提出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的范畴”（1986年）；接着，鲍克在《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1989年）中提出“要用包含社会性别的方法去做通史，……妇女史就是出色的社会性别史”的目标。鲍克的文章旨在强调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历史的范畴，而反对以往用生物学的眼光看待历史中的男女两性。用社会性别视角、眼光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不但在历史研究中分别有了妇女和男性的社会性别史，也有了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史，即社会性别史；而且这里所说的社会性别史不是用“性别中立话语”进行社会探究，而是必须看到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下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历史。这在当时西方史学界是一场围绕上述诸方面的多种争辩和论战。20世纪90年代斯科特主编《女性主义与历史》（1996年）提出“差异”（difference）概念的重要性，指出社会性别不是唯一的分析范畴，除了性别以外，还要注意因为种族、族裔、阶级、年龄等身份形成的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差异同样是重要的。

其二，名至实归，理论的深化促进研究的深入。从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史发展的变化，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研究理论（包括方法论）的深化和研究实践的深入。正如鲍克在1989年撰文指出的：“妇女史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类的一半，而是全部。”所以“社会性别”的新视角就要求研究者转向不只关于“妇女”和“妇女问题”，而是必须包括那个社会的全部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意味着通史也必须被看做是两性的历史，被看做社会性别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普遍被用于历史研究时，斯科特又提出了社会性别不是唯一的分析范畴，妇女的身份和身份认同（identity）差异的复杂性，就是将妇女置于多种社会范畴——包括国家、地区、种族、民族、阶级、宗教、性倾向，把妇女间的“差异”作为女性主义史学的分析范畴，正是为了加深对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本质”的大一统的“妇女”被打碎后，身份各异的妇女在“差异”的基础上广泛“结盟”互相支持，在实现各自的目标的同时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也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个途径。

其三，学术刊物：助推理论深化和争鸣。从“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史”的变化走向，也体现在学术刊物的命名和办刊宗旨上。该译文集用《关于“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刊物的讨论》的标题收入了三篇文章——其中有美国1989年《妇女与社会性别史》期刊创刊号的编者按《为什么是〈社会性别与历史〉？》和《妇女史期刊》20年回顾文章两篇，还有英国1992年创刊的《妇女史评论》的发刊词。

上述鲍克的文章就是《社会性别史》创刊号推出的力作。作者力主社会性别史应该成为历史研究中女性主义声音的主流。而同期发表的20年前创刊的《妇女史》回顾文章中坚持妇女史的办刊宗旨,并对社会性别史的局限性提出警示。指出早期的妇女史研究因其偏重“共性而不是分析和变化”而政治性有余历史性不足;而现在,因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即“妇女研究变得越来越相对化和非政治化”;还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如“男性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等“热门”方向导致妇女研究多视角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轻率匆忙地采用‘社会性别’而不用‘妇女’一词,也使我们面临一种危险,这种做法可能会钝化我们的政治锋芒,弱化全体妇女间潜在的联盟,令我们采用一种更为中性的立场,对男人和女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问题给予同等关注。”其实,《妇女史》编辑者们与鲍克的忧虑不约而同,已经看出当时出现这种忽视妇女的倾向。1992年创建于英国的《妇女史评论》,显示出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的整合与合流趋势,如主编者在创刊号上提出“希望《妇女史评论》成为探讨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的论坛。因此,我们希望收到有关以下话题的实质性对话,这些话题包括:妇女史、女性主义史、社会性别史、黑人妇女史、女同性恋史,以及一些相互关系问题,如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史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和妇女史之间的关系等等,实际囊括了几乎所有有争议的主题。我们的目的之一是扩大妇女史研究的范围,希望收到各个学科的来稿,如妇女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社会学、文学、政治学、人类学、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哲学。”

其四,分析框架和方法论的融合与深化:父权制—社会性别—后结构主义。诚如《妇女史期刊》20年回顾所指出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妇女史理论(方法论)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又出现“相对化和非政治化”的倾向,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个阶段理论和方法的丰富性、深刻性和深远影响仍是妇女史发展的主流。妇女史研究的初期更多使用父(男)权制的分析框架,杰达·勒纳所著《父权制的创立》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将社会性别引入妇女史研究确实改变了研究

面貌。本译集收录了琼·威·斯科特的《经验的证据》，这是继她影响深远的名篇《社会性别：历史研究的有效范畴》（1986年）和《女性主义与历史》（1996年）提出“差异”之后的又一篇力作（前两篇中译本已收入三联书店在1996年和1998年出版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和《社会性别研究选译》），该文的价值在于颠覆影响历史学界近两百年的实证主义的两个理论基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信理性是绝对的，经验是客观的，具有理性的人能“发现”“客观”的“真相”和“真理”。但斯科特认为，经验不是透明、客观和中性的，它本身也是被建构的，主体能动性是在话语论说（discourse）系统之内，是话语建构了主体的经验，经验之所以需要解构是因“经验”的主体也是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历史学和其他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从来就不是客观和中立的，历史现象和史录不是“透明性（transparency）”的，看到的史料不一定是对真相的记录，作为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的记载，文本是经过过滤和加工的；即使是个人“经验”的事实，在“再现”复述的时候也受主体的影响。

与斯科特进行对话并发展其观点的是凯瑟琳·肯宁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女权主义历史——对话语和经验的历史化》。肯宁认为，后结构主义语言转向意味着对妇女和性别史的意义和它对历史研究与写作产生深远影响。语言学转向在历史领域中，意味着人们追求的是对再现的历史分析，而不是追求那种可辨识的、可挽救的“真相（reality）”。跨学科挑战了各个学科基础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人们所熟悉的传统学科的研究工具、概念和方法变得捉襟见肘。对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关键词如经验（experience）、主体能动性（agency）、话语（discourse）和身份认同（identity）的重新定义必须放在跨学科的争论内进行。这是肯宁对斯科特理论的承续。但肯宁对斯科特把“主体能动性”局限在“话语系统之内”从而低估了“愿（欲）望（desire）在变革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评；她认为“主体性不但是磋商话语与经验的场域，而且主体性还驱散了‘话语

一直建构经验’的定论”。这是肯宁对斯科特的发展。

肯宁和斯科特都是欧洲史研究学者尤其以德国史为专攻，她们的理论建树皆是建立在实证甚至个案方法上提炼出自己的理论的。另一位欧洲史学者朱迪斯·贝纳特的文章《如何面对连续性：从西欧妇女经济地位谈起》，是从历史的纵向维度通过妇女经济地位谈妇女经验的连续或断裂的发生对妇女地位长期连续的影响，引起作者重新解释妇女的历史。她用自创造“父权制的动态平衡（patriarchal equilibrium）”概念进行观察分析，看到在西欧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都急剧变迁的时代，欧洲妇女地位却稳定不变。她发现，尽管妇女的“主观经验”有变化，也并不表明妇女实际地位相应变化。她指出，一些妇女历史学家在妇女史的叙述中，常常过分标榜变革与变化，没有看到父权制的动态平衡导致的连续性使妇女地位原地踏步。作者用一个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酿酒的例子说明“父权制动态平衡”这一概念能引发新的和建设性意义的话题。可见，父权制理论的探讨、发展和运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大有空间和前景的。

邦尼·史密斯的《历史科学有性别吗？》一文对传统史学的挑战走的是另一条路，直接对“科学历史学”和实证主义神话进行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该文是她的专著《社会性别史：男人、女人与历史实践》（*The Gender of History: Men, Women, and Historical Practice*）的要点荟萃，其中心论点是，历史学在西方形成一个专业学科的过程中，从头到尾都带有性别属性。所谓“历史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男轻女的偏差；也就是说历史科学在口头上服膺客观和统一真理标准，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往往助长了男性历史、男性史家及男性学术系统的优势。作者用大量翔实的历史事实进行论证：首先，从19世纪开始排斥非专业者尤其是妇女的历史写作，贬斥她们的著作不科学；接着利用有写作才能的妇女和家庭成员做他们写作出版的助手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进一步，男性历史精英用研讨班的建制和对档案学的垄断使历史学成为少数男性专业化、科学化、特权化和男性气质化传承的职业，与此同时，通过对档案资料的狂热膜拜和独霸特权建构

了男性垄断的性别化的“科学历史学”；进入20世纪，女性史学家跻身于历史学家队伍，但19世纪的“科学历史学”的遗产依然排斥女史学家也包括贬斥妇女史的成果。

这里用较多的篇幅介绍第一部分文章的概要，是因为这些名作曾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欧美甚至全球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走向，而中国妇女史学界和妇女研究界除了“社会性别”外，较少关注比较艰深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更遑论有选择和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土研究。至今，史学界客观、中立的认识论和不加反省的实证主义方法仍大有市场，妇女史研究领域也少有突破。也许这组文章有裨益于开启国内研究者更多的思考、反省和创新。

第二部分“中国研究”，从海外汉学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中仅仅选了4篇，这是因为国内出版了大量的海外汉学界的优秀专著，在国内学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史学方面，对像苏珊·曼、高彦颐、贺萧、伊佩霞、白馥兰、费侠莉、韩启澜等人的著作并不陌生，但对她们著述的有深度的中文评论还比较少见。这里展现的两篇书评，其一是丽贝卡·E. 卡尔的《中国历史与社会性别》，评论的是白馥兰的《技术与社会性别——元明清的权力结构》和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卖淫与现代性》。卡尔指出两书的特点是使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和空间中迥然不同的问题。白馥兰对元明清（公元1000—1800年）她所称的“女科技（gynotechnics）”的分析主要基于对物质文化的阅读，提供了探究宋以后中华帝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统一和持久的一个方法；而贺萧对19世纪和20世纪末上海卖淫话语的分析是对文本资料做解构式的阅读，从而来理解这些话语如何成为中国向“国族”和“现代性”的现代转换的组成部分。两本书在方法论上都将社会性别融入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研究，不仅向中国研究者，也向社会性别、现代性和技术等问题的研究者提出了极其重要的问题。但卡尔也直率地指出两人在史料的处理上走了两个极端——白馥兰对资料表现出明显的不加审视的经验主义的轻信，赋予“技术”毫无根据的透明性；而贺萧过于谨慎，始终提醒读者她

的史料的不透明性，这导致读者对她的阅读的疑问，也影响作者对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做更深入的探究。卡尔认为二人应互补借重——白馥兰多一点贺萧对史料的批评态度，而贺萧多一点白馥兰对物质的关注，将相得益彰。而苏珊·曼的《东方主义时代前的中国妇女史》一文，分别对伊佩霞的《深闺：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和高彦颐的《闺塾师：十七世纪中国妇女与文化》进行评论，重点讨论两部著作提出的方法论中的问题和潜力，指出两本书用一个共同的历史综合角度提供一个总的框架，提供了一个观察前现代中国妇女的新视角即将妇女作为历史的主体，而不是父权制压迫下的牺牲品。还指出两书在时间焦点和资料来源方面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力图将妇女表现为全面参与历史巨变过程的主体。曼也指出两部书在资料来源方面的差别：伊更多依赖男性的作品来建构她对女性生活的描述，高的研究结论则几乎完全建立在她对女性创作的诗歌、书信、传记、序文的思考上。可以看出，两篇书评会给我们提供 20 世纪末美国汉学界基于中国妇女史的研究范式、理论框架、方法史料的特点和贡献，更重要的学到严肃的学术批评如何有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而不是国内常见的书评不是空洞的套话就是谀辞和“棍棒”。

与两篇书评关联紧密的内容是 2003 年苏珊·曼、高彦颐 and 贺萧的《三人谈：书写中国妇女史的问题》一文，这是她们在 30 年来中国妇女历史书写经历中的真切感悟，无论以文献为主的古代史还是以口述为主的现当代史，无不反映了她们在理论、方法上不断的突破超越，才有新的发现。如高彦颐谈到从社会史方法的妇女史到文化史方法的社会性别史，一贯重视家族史的苏珊·曼从最近的发现法氏的研究中，从一个家族观察性别内/外关系的微观方法的新发现，以及贺萧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妇女对口述史运用的感悟，得出既不能没有也不能依赖口述的体悟；特别是她们在对后结构主义的共同反思中，如何处理诸如“主体”“妇女”和“社会性别”等理论范畴以及材料处理方法的体悟，将对中国同行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一篇从哲学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的性别歧视论》的论文是两位

美国男性哲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合著的，作者在与西方的“二元论性别歧视主义”比对中将中国儒道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定名为“相关的性别歧视主义”。作者从中国性别哲学的和谐整体性中发现存在的性别歧视主义，这种性别歧视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相关的、柔性的性别歧视，从儒家和道家的性别哲学如所谓“生产”即阴阳关系在化生中的和谐推导出关联的性别模式，强调伦理的整体性和审美的一致性，从而把差异协调起来，但正是在差异中体现出了等级。于是作者得出结论：“儒家对于男女冲突的解决方法是三重的：功能上的分离，承认等级制，在相关中充满了相互之间爱和尊敬的唯心主义的禁令。”这对当下中国思考如何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是有现实意义的，一味不加分析批判地弘扬传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付出代价的。

第三部分是介绍美国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历程的四篇文章。希尔娜·格拉克的《妇女有什么特别之处？谈妇女口述史》首刊于1977年，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妇女口述史来说，该文总结和讨论了关于口述史访谈的进程、原则和材料整理等方面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成为美国妇女口述史理论和方法探讨的开端。另一位女性主义口述史的先驱者苏珊·阿密特支的《下一步》发表于1984年，作者除了肯定该领域取得的进展而欢欣外，重点提出“下一步”应深入思考的议题，诸如“用女性的眼光看世界”意味着什么？如何对口述内容加以分析和阐释？作者认为，首先，作为访谈者应和受访者一同来发现并探讨她们的生活，假设客观、中立的观察者是不真实的；其次，如何听声音并从中发现有关意义（meaning）、可比性（comparability）和背景（context）的问题，比如在倾听中如何扩大性、计划生育、怀孕及其他有关生育的问题；理论视角也是重要的，如持女性受害论（victimization），还是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抑或是正面肯定（positive affirmation）？这些也决定于访谈者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发表于1998年的《对妇女口述史的反思》，是两位美国妇女口述史创始人希尔娜·格拉克（Sherma Berger Gluck）和苏珊·阿密特支（Susan Armitage）

关于妇女口述史的电子对话交流。她们提出，尽管从口述史开展中听到许多妇女获得成功的故事而欢欣鼓舞，但这只是妇女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妇女史写作和教学的学者来说，应该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作为访谈者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解释加到她所听到的内容中，必须忠实于叙述者对她们自己生活的阐释，竭尽全力做到从她们的角度来理解，这就需要关注“大背景”的问题，也是“学者”进行历史化叙事（the “scholar” to historicize the narrative）的需要。不仅仅是妇女生活的条件，而且也包括叙述收集与叙述者和录音相关的具体环境以及政治和社会大背景。作为研究者还要认识到，即使是生命史（a life history），也只能反映部分事实；至关重要的是，如果能将这些环境条件解释清楚，会有助于理解事实的不完整性，这里还包括叙述者的“表演”（performance）的问题。两人还讨论了对叙述的意义的解释是面临的最大挑战，必须努力寻找对意义的理解、与叙述者合作的途径，这就需要做大量心灵探索。在口述史中，认为“让她们为自己说话吧”是一个虚伪的立场；叙述者的叙述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故事、一种再表现并受到多种复杂的决定因素的制约，访谈者和研究者有责任将这些叙述进行历史化和语境化。埃米莉·霍尼（韩启澜）在1997年为参与的口述项目所写的《罢工生活：口述史和记忆中的政治性》一文，就是对上文最好的注脚和诠释。作者对1972年到1974年得克萨斯州某制衣公司罢工的墨西哥裔制衣业工人进行一系列口述史研究，该文重点探讨如何听声音和探意义，叙述者讲述的现在和过去的联系，特别是“现在”如何影响他们对生活史的讲述。当她对那些叙述进行批判性解读时，发现它们是某一特定历史时刻（语境性）的产物，明显地看到“叙述的现在”和“记忆的未来”之间的关系——罢工后现在的她们——工会积极分子对讲述的童年反抗和果敢的故事感到骄傲；然而有时也强调从罢工前的谦卑服从到罢工后的勇敢坚毅的转变的人生故事，将罢工前后的个人一分为二对立起来。特别是当受访妇女们揣摩关于“罢工经历”的访问者想听什么故事时，就会迎合需求出现戏剧化的一种访谈“表演”，如现在可能忘记以往

揭示的记忆而促使她们歌颂从前看来不重要的经历，或者将童年故事进行了润色和重新改编。所以，霍尼还认为应该把口述作为一个妇女生活史许多可能的叙述之一，而不是她唯一的“真实的”经历来对待。霍尼坦诚地总结道：“口述史像自传一样，并不是历史或经历，而是对它们的复述。”这与贺萧在八年后所说的“既不能没有也不能依赖口述”的体悟前后呼应。鲍晓兰的《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和思考》，是以中外贯通的学养和亲力亲为的经验并用国内熟悉的语言表达习惯来谈她在写《美国纽约华裔制衣女工》博士论文进行口述的体会心得，包括如何听声音、如何挖掘声音背后的意义，且结合中国的需要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该文首次发表在1999年8月天津妇女史学科建设研讨班上，并在国内被多次收录刊登，相信今天重读仍意味深长，特别在口述史和口述访谈广被使用的今天，阅读鲍文和另外的四篇译文会大有裨益的。

杜芳琴 蔡一平

2014年12月于天津

目次

第一编 理论·概念·方法论

- 01 妇女史的挑战
-----[美] 杰达·勒纳 001
- 02 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
-----[美] 吉塞拉·鲍克 013
- 03 关于“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刊物的讨论
-----[美] 朱妮·珀尔维斯，等 039
- 04 如何面对连续性：从西欧妇女经济地位谈起
-----[美] 朱迪斯·贝纳特 058
- 05 历史科学有性别吗？
-----[美] 邦尼·史密斯 079
- 06 经验的证据
-----[美] 琼·威·斯科特 108
- 07 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女权主义历史
——对话语和经验的历史化-----[美] 凯瑟琳·肯宁 138

第二编 中国研究

- 08 中国特色的性别歧视论
-----[美] 郝大维、[美] 安乐哲 169